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研究問題產生動機通常包含了以下四大類：一、學理上的探究；二、開發新的科技；三、社會上的需要；四、個人因素的影響（朱宏源，2006：71）。在本文中，筆者將對現有的學理部分做一個說明及探究，並對於兩岸文武關係發展的差異性及對未來兩岸和平所產生的影響做一個探討。

二十世紀末期，所謂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的浪潮襲捲了全世界，使得新興的民主國家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這是人類史上的一大盛事。¹促使威權統治、軍事體制和個人獨裁政權迅速瓦解；自由民主國家被廣泛地視為是唯一真正具有現代化意義的國家，民主政治也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的主流象徵。台灣地區在西元 1996 年 3 月舉行總統大選之後，也在此年正式被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列入 “選舉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國家²。（李西潭，1997：133）當時李登輝先生、連戰先生當選了第一屆的民選總統、副總統，對於當時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震撼，因為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了數十年之後，人民終於可以真正當家作主人，也真正落實了主權在民的理想。在當時，台灣地區已經

¹ 杭廷頓所謂“第三波”的民主化潮流，起於 1970 年代的南歐，在 1980 年代初期與中期散佈到拉丁美洲與亞洲地區，然後在 1980 年代晚期與 1990 年代早期的時候傳布至東歐、蘇聯地區及少部分的非洲國家。它創造了民主的時代（age of Democracy），使得世界的國家之中第一次有過半數以上的國家擁有了民主國家的政府模式。

² 參照李西潭〈文武關係與民主鞏固初探〉一篇文章中提到，台灣在 1996 年三月舉行總統大選之後終於被「自由之家」列入全球一百八十一個「選舉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也是七十九個「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國家之列。

解嚴，開放黨禁、報禁…等自由權³，台灣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加上民國四十七年所成立的警備總司令部於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一日正式裁撤，代表著戒嚴時期的恐怖單位也正式消失。⁴

而軍人的角色在解嚴之前，對於國家內外安全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國家的一切事物都以軍事優先。但隨著民主化的腳步，軍人在國家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漸漸受到重視。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著名的《第三波》一書中探討民主轉型的問題時，就是如何減少軍人干政和建立專業的文武關係。他並指出所有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就是必須遏制軍人的政治權力，使得軍隊成為保國衛民的專業組織（Huntington，1991：209-231）。回顧我國的軍隊與政治發展，可以發現到我國國軍的發展隨著政治的發展而演變，期間文武關係的類型亦產生變化。解嚴之後，國軍已經朝向「專業化軍隊」邁進，尤其是國防二法的通過，加上二千年總統大選政黨的輪替，對台灣當時的政局產生莫大的衝擊，許多人無法接受此一事實，國軍的角色問題及效忠問題也成為當時關鍵的問題，此時文武關係的發展正走向一個新的世代。

在 2000 年的總統大選中，由民進黨所提名的陳水扁與呂秀蓮當選為第十任的正、副總統，結束了國民黨超過五十年的統治，對於台灣政局產生極大的衝擊。而以往的國民革命軍的效忠問題也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³ 參考憲法中關於人民自由權的規定。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的自由。」，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的自由」。

⁴ 警備總司令部，在戒嚴時期所扮演的是保防、安檢、肅清匪諜的工作。因此警備總部可以算是戒嚴時期的象徵，因此警備總部的裁撤所代表的意義便是人民將不再受到如白色恐怖般的受到監視、監聽。逐漸將憲法第二章所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逐漸還給全國人民。

毛澤東在創立軍隊之前，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建立軍隊後，又提出了「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主張。事實上在戰爭年代，「槍就是黨，黨就是槍，沒槍就沒黨，沒黨就沒槍」，黨與槍是共生的，一體的，大部份共產黨的官員，既是「將」，又是「相」（既是軍官又是黨員），集文武於一身。毛澤東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中表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絕不容許槍指揮黨。」⁵

中共自 1927 年建軍以來，所強調的是「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而從中共發展的歷史上可以見到，如「中印邊界衝突」、「中越戰爭」、「六四天安門事件」，都顯示著共軍是作為黨達成目的的一個工具。堅持著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共軍絕對服從黨的指揮，正是共軍建軍的基本原則。但是隨著冷戰時期的結束，國際局勢產生新的變化，共產黨的勢力隨著蘇聯的瓦解，逐漸萎縮。而在 1990 年代中期鄧小平辭世之前，中共的文武關係已經處於一個變動的局面。黨與軍的雙重菁英模式已經不復見。但是在中共官方的立場仍是：軍隊必須要服從黨⁶。近年中共文武關係的發展是逐漸走向「軍隊的國家化」，軍隊國家化可以使得軍隊免於政治動亂之外，並且同時確保有足夠的經費與支援來維繫國家的安全。這也可以使得中共的軍隊可以如西方國家軍隊一般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下求發展。新一代中共國家的文職領導人如江澤民及胡錦濤等，他們都是缺乏一個強力的軍事後盾及軍事經驗之下來領導國家及軍隊，但是軍隊國家化的制度之下似乎

⁵ 請參考《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512。

⁶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解放軍七十五週年之歷史教訓》（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十月），頁 508。

能夠保障一個「文人領軍」的模式，而此項「文人領軍」的模式正是中共一直以來所欠缺的。雖然國家的官僚組織已經強化了對於軍事的人事任命權及預算的決定權，但其中在文武關係上也存在著若干的疑義與衝突⁷。

然而世界局勢丕變的結果，使得新一代的年輕人對於中共「以黨領軍」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隨著中共建國以來領導人逐漸過世，尤其是老一代的軍中領導人逐漸退出政治舞台後，中共的文武關係產生了一項新的變化，解放軍也面臨了一項新的挑戰，即出現「文人領軍」的新局面。

二、研究目的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之下，新興民主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第三世界國家也從以往的軍事極權統治逐漸走向民主。台灣地區自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由於國家安全的需要實行了相當長時間的軍事集權統治，但是隨著經國先生解除了戒嚴時期，開放黨禁、報禁和集會遊行的限制，社會也從過去的極權社會轉型為多元民主的社會。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的發展，「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的議題成爲了我解嚴後的一項重大政治工程。在政治民主化的同時國軍也面臨了兩項重大的挑戰：第一、隨著「國防二法」的頒佈施行，我國也走向了「軍政、軍令一元化」、「軍隊國家化」的目標。軍隊不再是一黨達成目的的工具，而是真正屬於國家、屬於全國人民的軍隊。軍隊也不再干預政治，逐

⁷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解放軍七十五週年之歷史教訓》（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十月），頁 510。

步走向專業化的軍隊，文人國防部長可以直接統御軍隊，已經不如以往軍隊必須由參謀總長直接指揮。第二、隨著兩千年總統大選的衝擊，在野的民進黨取得了政權，台灣邁向了首次的政黨輪替，對當時的軍方造成了相當大的震撼。

然而隨著全世界都在進行民主化腳步之時，世界人口最多的對岸，對於民主並不跟著前進，仍然實行著一黨專政的統治模式。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心思想領導之下，軍隊對於對岸領導人權力的鞏固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毛澤東及鄧小平時代，由於兩人都出身於軍隊，或甚至於是參與革命戰爭，軍隊對於其服從當然是無庸置疑的，但是解放軍近年來卻必須面臨一項新的挑戰，就是「文人領軍」的挑戰。就解放軍的整體發展來說，中共的新一代領導人對於軍隊的政策應是如何推動解放軍的全面現代化，包含著硬體、軟體、指揮及管制。所培育出的專業化軍人在日後不但能夠推動軍事現代化、並且不干預政治的運作，所做的只是達成「專業化軍隊」的目的⁸。

然而民主與共產的政體、特殊的敵對關係都使得兩岸在政治發展上有著不同於一般常態國家的關係。相對來說文武關係發展上自然有所不同，雖然中共已從事軍事專業化，但是文武關係上仍脫離不了「黨」，本文筆者要將兩岸發展的差異做一個比較並且對於未來發展做一個評估與展望，希冀從兩岸政治體制的不同所導致文武體制不同，來分析未來兩岸之間和平之展望，並希望能從中發覺兩岸在經過文武關係轉型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困難及現今狀況為何？這些都將是在本

⁸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譯，《人民解放軍與變動中的中國》（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一月），頁71。

研究中所要積極瞭解的。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問題

(一) 西方國家所發展出來的文武關係理論對於我國的適用性，我國在文武關係轉型的過程中如何避免轉型中可能發生的政治危機。

(二) 由共黨國家黨軍關係理論分析中共黨軍關係的發展，並且由中共建軍基本理念來看解放軍的政治角色。檢證解放軍政治地位在中共歷代政治領導人交替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 兩岸文武關係發展的差異性來分析兩岸未來和平的展望，並引入世界和平指數（GPI）來檢視兩岸和平指數及對未來發展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此項研究是以文武關係的理論來觀察兩岸之間文武關係的發展，一個共黨國家及一個民主國家發展上的差異，並且在未來世界國家大都邁向民主化國家之時，中共若仍然維持著其共產體制，對未來兩岸的和平展望又有何重要的啓示。研究途徑是指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如政治現象）的研究，到底是從哪一個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處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由於著眼點的不同，就會各有一組相配的觀念作為其分析架構（朱宏源，2006：182）。

研究方法的目的是在於能客觀的進行資料的蒐集，而研究方法更是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的重心。研究方法必須依序研究問題與資料來源及針對被研究對象，來決定一種最適當的方法（宋鎮照，1997：97）。本文將採取下列的研究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一般研究學問或事物，最常使用也是最直接的研究方法。歷史是某一個時代發展與變化所不可抗拒的長河（王玉民，1994：11）。一個社會的發展，不論其結構如何的保守和穩固，都無法置身於變化發展之外。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是在描述歷史的事實，指出某一特定時空所產生歷史事實的相關前因或後果，並且從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聯中去「重建過去」(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的一種工作，注重特定的時空與事件，因此，歷史文件中會充滿著人名、地名及年代（易君博，1993：164-165）。從事歷史的分析，就是必須蒐集每一段的歷史事實，根據其前因後果去解釋歷史所發生的原因。因此，歷史乃是事實通過時間連結而構成的變化過程。在分析問題之時，不僅就當前的變數關係作一個深入的探討，也要對於這些變化作一個歸納、驗證及分析的工作。

在本文架構中，將要藉由台灣及中共過去文武關係發展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及事件做一個歸納、分析及比較，希望藉由事實的陳述來瞭解兩岸間文武關係發展的模式及其相異處。

（二）文獻分析法：

此研究法也稱之為檔案探究法 (archival data)。文獻的資料具有下列三大類：一為政府出品的正式文件；二為私人的傳記、日記、回憶錄及書信等；三為在媒體或學術刊物發表的文章或論述 (余炳輝, 1987: 151)。此種研究方法為探索性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據此指出需要驗證的假設，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來印證研究者的看法。由於本研究關係到兩岸之間文武關係的發展及互動，因此在資料的蒐集上包含兩岸方面所出版的相關資料、媒體報導、文獻、政府部門的相關發言、專書、論文、期刊及網頁等，以提供本研究作為分析提供足夠的資料。

兩岸文武關係發展的過程中，觸及到相當敏感的政治議題及軍隊，對於官方報導及說明將會有所侷限，筆者將會利用各類官方資料、報導及期刊分析來瞭解文武關係發展對於兩岸的影響。

(三) 比較研究法

在研究政治學的領域中，在從事區域研究時長常會使用比較研究法。此研究方法的原理有二：在於比較其相同處或相異處。比較法在資料上可以分為定性研究及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法是指蒐集待比較的文獻資料作分析；定量研究法本質上在比較不同主體在同一問題中之因果關係之同異，在實做上常以統計作為分析。若是以比較法對某種特定主題作研究，然而所蒐集的資料具有歷史性的時候，此研究方法又可以稱之為歷史比較法。(王玉民, 1994: 249)

在本文中是以文武關係作為主題，主要在比較雙方文武關係的差異，而在比較其差異性的同時，將會就其發展歷程的不同、意識型態、政戰制度、民主化、

政治體制等各方面做一個比較分析，當中將會引用部分中共建國以來文武關係資料及台灣地區在民國 38 年至解嚴時的文武關係資料。因此本論文所著重點在於定性的比較研究法及部分的歷史研究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主要將以文武關係的理論觀點來探究，兩岸間由於特殊的政治關係、政治體制不同的狀況之下，所呈現出文武關係發展上的差異，並且希望能夠就文武關係發展的歷史上面來分析當前在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之後，台灣在 1996 年的總統直接民選後已經進了民主國家之林，進而在 2000 年經過了第一次政黨輪替，逐步邁向民主鞏固、民主深化；反觀對岸，至今雖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的對外開放，但在政治體制上仍維持著其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加上對台關係的特殊，因此在文武關係的發展上也和一般國家有著差異性存在。

在時間的界定上都將從國共鬥爭，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說起，著眼點在於瞭解兩岸文武關係發展的歷史，但在歷史發展的說明上將會對兩岸當時特殊的敵對關係所發展出的基本理念做一個說明，進而來探討當前因為兩岸體制上的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文武關係，最後將會以兩岸發展的模式來探討對於兩岸未來和平的展望。我國研究的主要方向將放在解嚴後的文武關係發展、演變、及現況，尤其在國防二法實施及政黨輪替後，對於文武關係的發展衝擊更大；而在中共方面將著

重在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的文武關係發展，因為從江澤民時期開始對於解放軍來說，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就是「文人領軍」，於此，也將從西方文武關係理論中，關於「文人領軍」的部分作一個探討及分析中共的現況。

二、分析架構

分析架構是所有科學研究的主要工具，因為它提出了引導我們選擇事實和說明事實的基本概念、假定、觀念和暗示等。對於政治現象的探究，分析架構所扮演的角色是協助研究者更有系統的釐清事實真相（Isaak，1985：185）。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以文武關係理論來分析兩岸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文武關係發展，及對於兩岸的和平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在建立分析架構之時，我們必須要先瞭解兩岸的政治體制狀況，因為政治現況往往對於文武關係的影響是最深的。第二、我們必須要體認到兩岸關係發展的特殊性，因此文武關係的發展上有著一定的相似處；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第三波民主化的開展，使得兩岸的文武關係發展相距越來越大，一邊是已經民主化，而另一邊則還是屬於一黨專政的共產國家。兩邊分屬民主及共產體制，那對於兩岸和平是否有著影響呢？根據民主和平論的觀點認為，民主國家間不會發生戰爭，但是一邊民主，另一邊為非民主則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⁹

⁹參考李西潭、張孝評，〈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四十三卷第四期，2004年七月，頁10。民主和平論之說首先是由Immanuel Kant所建立，他認為國家具有自由形成共和的自然傾向，因為建立了自由共和的民主國家之後，會導向一個和平的關係，因為民主政府受到公民的控制，民主政府並不會讓公民並受到戰爭的傷害。Kant認為，民主和平聯盟的基礎乃是在於建立在下列三項要素之上：第一、民主國家存有和平解決衝突的文化；第二、民主國家

本文第一章將從研究的動機及目的開始說明，陳述研究方法、研究架構及研究限制，並且簡述相關的理論及概念。說明本文研究的重點以及因為兩岸政治體制與特殊的發展關係可能演變出來不同的文武關係形式。

第二章將要進行文武關係文獻的探討，所涉及的文獻部分包含了西方民主國家的文武關係理論以及第三世界與共產國家的文武關係文獻，也將歸納出國內各學者對於文武關係的研究成果。在文獻分析的理論整合之下，可以瞭解到兩岸之間在文武關係發展上基本的差異，加上特殊的政治關係以及台灣在民主化後，文武關係的發展更趨近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文人統制」及「軍隊國家化」的概念。

第三章將對台灣地區文武關係發展做一個介紹及分析，並與文武關係理論相結合。首先將會以戒嚴時期的文武關係做一個起頭，由於當時的國家處於一個特殊的狀況，所以在統治上一切以軍事優先，服從國民黨的指揮，也無所謂「軍隊國家化」的概念。¹⁰台灣當時所要面對的內外局勢相當險惡，因此在面臨國家存亡之際，保障人民安全為首務，唯有依賴軍事化的集中管理才得以成功。政府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¹¹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台灣省政府發佈戒嚴令起實施戒嚴。至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戒嚴令解除為止，台灣總共經歷了三

在共同的道德基礎上產生關連性；第三、民主國家的經濟合作邁向互利。

¹⁰ 所謂「戒嚴」係指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如叛亂、戰爭狀態或是即將發生戰爭而論），為了鞏固國權、保障民權、維持社會安定，由法定機關經由適當的程序，於全國某一特定地區，實施兵力戒備，將該區行政權或司法權一部份或是全部交由軍事機關來行使，並且停止或限定憲法所賦予的人民權利自由，其目的乃是在於犧牲少數人之自由，從而保障大多數人的自由。

¹¹ 依據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程序，制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一條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經上的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或四十三條所規定之限制。換言之，因國家動亂，所以在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日公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台灣地區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宣佈戒嚴，自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其法源依據。

十九年的戒嚴統治，其間戒嚴令的實施廣泛地凍結了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義務：諸如言論、出版、講學、集會、結社等自由受到限制。而在解除戒嚴令之後，台灣地區在解嚴之後，不論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政黨以及軍隊方面，皆已邁向多元化的民主類型，其間多次代表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性選舉尤為重要。在兩千年政黨輪替之後，我國的民主轉型當可稱為邁向下一個階段的「民主鞏固」。¹²而民主鞏固的一項重要條件便是「減少軍人干政」，杭廷頓在《第三波》一書中所提到的民主轉型的問題之一便是如何減少軍人干政及建立專業型態的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他指出：良好的文武關係是國家安全政策的一個面向，文武關係的安全是國家軍事安全的基礎(Huntington, 1957: 2)。台灣此時文武關係的發展也有重大的轉變，逐步走向民主國家的發展模式。國防二法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一日實施，也確立了軍政、軍令一元化，文人統制的法制基礎。此章重點便在於解嚴之後我國文武關係發展的變化，並且展望未來發展的模式及兩岸和平的問題。

第四章將要介紹中共從 1949 年建國以來，文武關係發展的基本理念，便是「槍桿子出政權」，「對黨的絕對服從」。毛澤東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中表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絕不容許槍指揮黨。」¹³毛澤東的此項理念也影響

¹² 對於「民主鞏固」一詞，有部分學者認為民主鞏固作為消極的概念，就是要使民主化的成果不至於「崩潰」與「回潮」；作為積極的意義，就是將民主制度深化。因此其實「民主鞏固」並非一個相當明確的概念。Linz對於民主所指出的面向，對於新興的民主國家不失為一個兩好的指引，對於文武關係更是如此。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97)。

¹³ 請參考《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頁512。

中共文武關係數十年。直到鄧小平晚期，江澤民即將要接班時方有重大的轉變。本章將對江澤民以前的中共文武關係發展及建軍基本理念做一個介紹及分析，以便瞭解到中共近期來的發展模式。著重點是在於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的文武關係，因為此兩位中共的接班人對於解放軍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五章將要對兩岸文武關係各方面的相同處及差異性做一個比較。文章將會從領導人的差異、政工制度、民主化程度、軍事現代化、意識型態及軍人參政等各方面進行探討。文武關係的發展不外乎文人軍隊的互動，然而造成文武關係最大的差異卻是在政治體制上的不同，本文也會藉由政治上差異所演變出不同的文武關係及特殊的兩岸關係探討，希冀藉由最根本的政治體制、意識型態差異來分析文武關係發展。

第六章為結論，首先將對兩岸文武關係差異做一個分析，台灣地區是邁向西方文武關係模式前進，然而中共方面仍然是脫離不了「以黨領軍」的模式，台灣地區在不斷改革下，已經逐漸達成軍隊國家化、文人領軍的良好文武關係模式，最後將對於兩岸和平做一個分析及展望，使我們瞭解到在文武關係體制上的不同對於和平間可能造成的影響，並評估兩岸未來因為文武關係發展上的不同可能產生戰事與否。也將利用在 2007 年所公布的全球和平指數（GPI）¹⁴來瞭解中共與台灣在和平指數上的差異，並希望台海和平做一個前瞻性的分析。

¹⁴由澳洲科技產業企業家同時也是慈善家基利亞發起，與「經濟學人資訊社」共同進行的全球和平指數，引用包括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資料，以包括國家的軍費支出、國內因組織性衝突死亡的人數、聯合國派遣人員數目、與鄰國的關係等二十四個指標，綜合分析計算，根據「暴亂減少」原則進行排名。

三、研究限制

對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上，凡牽涉於軍事方面，其研究上面的最大的限制便是在於國內對於軍事方面的研究並不十分普遍，加上專業軍事知識的不足，因此在國內資料的蒐集上會有其研究的困難性。國內軍事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屬於起步的階段，這方面資訊還相當缺乏，加上軍隊的保密限制，因此在軍方的資料上的獲得也有其困難性。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比較台海兩岸文武關係，主題研究上亦稍加廣泛，由於主題的廣泛也會造成此研究上有疏漏之處，因此在此篇研究將會對於範圍較大的結構性因素做一個比較分析，以利瞭解雙方文武關係發展上的差異。

不僅僅在國內文武關係的研究上受到了限制，對於中共方面的資料來源更是有所侷限。關於此項研究對於其民間及官方的研究上必須有相當的資料來源，但是對岸的政治體制之故，不允許人民挑戰中央的權力，因此在對於中共敏感的黨軍關係上當然研究也並不廣泛，並且媒體方面對於負面消息也不會加以報導，官方的統計資料更無法獲得，以上都為研究中共黨軍問題上的一大限制。加上筆者為軍人身份，無法進出中國大陸做個實地的探訪研究，也是其限制之一。

由於筆者的外語能力欠佳，無法完全直接由外文資料獲取資料，因此也影響了此研究的範圍廣度與深度。在資料的蒐集上將會對國內學者的研究及外國學者的研究做一個統整及分析，加上蒐集報章媒體對於兩岸間對於文武關係的相關報導及官方發言及出版品來探討，力求本研究的一個完整性及周延性。